

*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 By Mark Elvin. (London: Eyre Methuen Ltd., 1972. 317pp. £4.50.)

這是一本西方經濟史學者試圖以新的方法，新的角度解釋傳統時期中國社會經濟發展模式的著作。本書內容的主體是傳統時期的中國，但最終目的是在藉對傳統時期的研究以了解當代的中國。本此以言，此書仍未全能超脫西方人士把中國事物看做難解之謎的舊觀點。近年來西方學者爲了解釋當代中國所發生的一切，對傳統時代的歷史，本不同的觀點，發揮新義，有從某個別問題作線索而推論的，亦有從文化全體而着眼的。在近年多種同類著作中，本書是值得推薦的一本。我個人讀後的印象是：本書作者能從大處着眼，以中西歷史發展過程兩相參證，試圖尋求兩者演變不同之由來。對一般人而言，讀之殊有清新之感。作者所引用的資料論據可能有若干地方不够充實；但他在處理中國二千多年的發展史時，能以新的概念，新的分析方法，擇出促動中國經濟發展之各種因素，詮釋其相互間之作用，從而說明問題本質之所在，這是很可推許的。

本書之主旨所在，作者揭示得十分明白。作者提出了三大問題，同時他又試圖解答此等問題：其一，在中西歷史上，自古代以迄中古，羅馬帝國以及其他的帝國都先後衰亡了，何以中國能巍然獨存於世？其二，中國何以在十二世紀時能有種種科技方面的革命而成爲其時全世界最進步的國家？其三，這一登峯造極之狀態何以到宋代後即一蹶不振，竟不能產生進一步的科技以突破而產生類似西方之工業革命，其故安在？作者爲解答上述問題，將全書分爲三編，分別解答這三個懸案。第一編分爲八章，由第一章論國家版圖到第八章中國明代之軍需運籌術之優越。作者先試擬一個抽象的理論問架：國何以有大有小？大國何以能保邊防而自衛？何以大國過若干時後，常由一統而分裂爲割據局面？這些問題用傳統中國說法即何以天下大勢「合久必分」，而又「分久必合」？中西歷史之截然不同者：即在西方史上之演變，由古迄今，其大勢爲由統一而分裂，「合久而分」，但迄今此一方向未變，無復由分而再合，即分久而不再合。作者以西史爲證，提出之問題爲：中國何以獨能屢經演變，分合者再，結果仍趨於合，歸於大一統，仍能屹立於世？作者根據中國正史，將秦至清二千一百餘年的歷史，自其合、分着眼，劃爲三個段落：第一個合的局面，包括秦、兩漢、三國、西晉。繼即爲南北朝二百六十餘年之分的局勢。第二個合的局面爲隋、唐。繼之者則爲五代十國之「分」。最後一次合的局面包括宋、元、明、清四代。是爲「合」之再現。作者提出中西史興衰合分史迹之不

同，可以三個變數的結合關係說明之。此三者何？曰國土之大小（政令所及之版圖）；經濟生產力；政務國防費用對全部生產量之比例是也。與此三者密切相連而不可分者為同時期之科技水平，此所謂科技水平，泛指組織、經濟及軍事而言。凡一國之能擴大領域，必由於其在組織上、經濟上、軍事上，一方面的或多方面的能挾超越之優勢懾服鄰近各邦。縱不能三者皆獨操優勢，有其一亦足以彌補其他缺點。就軍事而言，有時軍力雖弱，但如軍需供應能運籌有術，亦足以補救軍力之不足。本此而推論，一國版圖之大小恆視上述三變數之變化而定。鄰邦一旦在三者之中任何一項獲得優勢，則必導致此大國版圖之受威脅。一個國家為保持其國勢，必須時時改進科技以超凌鄰國之水平而過之。國土愈大，則優勢之保持愈形必要。為保持此優勢，而設官建軍，兩者費用浩大，對國內將構成大消耗；又必致增賦加稅。征斂重，財政失其常經，農民無力繳稅，迫而投靠大戶以避稅，結果政府財源削減，獨立之民戶多變為依靠大戶之部曲。到了這地步，土地改革，各種重新分配政策的實行，是決定「天下」之「分」與「合」的關鍵。中國歷史與羅馬帝國歷史昭示：盛時由於徵兵之制，衰時種因於傭兵。後以軍用浩繁，政府迫而採用各種應急手段：綏靖、安撫、餽贈幣帛、允夷人屯居邊地等等措施。其結果則內部空虛，致於衰亡。但中國歷史自唐以來基本上能永保大一統，合的趨勢，而免於歐洲式的分而不再合，此為中西歷史之基本分歧點。作者提供的解釋如下：中國常時能在專門技術、軍事、經濟、組織各方面保持一方面的或多方面的優勢；雖不能面面皆保優勢，但一方之長即足以掩護另一方之短。所以能終久保持合的局面而成大一統，非若歐洲之以「分」為定局。本書之第一編第二編即是在證明此一理想公式之有效。

儘管有些讀者對於作者的假定，理論的問架，所持觀點不盡相同，作者這種刪繁化簡，於紛雜史實之中抽繹其網絡，提供一簡括方式，是有一定的啓迪作用的。作者以軍事與國課的關係論分合之相為因果。軍事糜費過重，歲入所得不足以供支付，則必致分割之局。蓋國土小則財政上之負荷小，可有餘力以作軍力之整飭也。作者在解釋中國傳統歷史上之「分」為暫時性的，而非永恆性的，緊接又補充了兩點：即中國在地理上——在歐亞大陸上——獨自成爲一個整體，而在文化上又獨成一體系。地理上之整體與交通運輸之方法有關，文化上之統一體系則始於秦之滅六國，統一政令文字，消滅各種分化力，以是政府得獨有武力，以是西方史上之封建制度不能在中國出現。中國大的都市，人口面積雖數倍於同時西洋之城市，但迄未能獲封建局面下商業城市之政制及自治

權。西方各國文化上形成多面性，各國之間有共同之道德價值觀念，但彼此互相競爭，故能促動進步，此與在中國之大一統的常局下，迥然不同：一為常時求保持均衡，一為力求突破均勢。中西歷史上分合之勢，此其大端。

作者提出的第三個懸案，何以中國在宋代工藝鼎盛之際未能在技術上突破傳統水平，發生類似西方的工業革命？關於這一問題，現代歷史學者及經濟史學者各有不同的見解。作者摘要舉出，予以評論：一、資本缺乏說。資本缺乏，故不能提高生產力；生產力低，故個人所得微薄；所得微薄，故無力儲蓄；結果仍終於貧乏。再進一步言之，生產力低，影響一般人之購買力，低的購買力不足以鼓舞投資者之信心。此又為缺乏資本之又一因。作者引用葉夢珠之閩世編，以明末清初上海一地情形說明一般消費市場之廣大及商人財力之集中，又以佛山鐵器、蘇州繡貨、景德鎮瓷器，說明中國在科技上之未有突破，并非由於市場之小或商人財力之不足。二、政治妨礙經濟發展說，如官吏對於商業發展之種種抑裁作用，商人之無保障，官勢之阻遏正常商業活動。作者以為在明清兩代，政治阻力對於經濟發展並不大。在提及政府貨幣政策時，他認為明清兩代政府在貨幣方面的決策，是明智而有積極建設性的。這一點是值得討論的。於此我們姑且提出兩點：其一、明清兩代，雖然中國已有較大量的銀，但廣大民間以用銅鑄的制錢為支付手段。銀集中於官府，集中於若干都市之商賈手中。民間日常交易，繳付國課多以錢折銀支付，在小說上、筆記上在在證明廣大人民間之因銀之稀覯而視之為寶，銅錢可以說是唯一普及的、無遠弗屆的交易媒介，在經濟活動上，重要性非常之大。明代至清，人口不斷增加，經濟活動頻率增加，但銅錢之供應因銅之缺乏而時發生幣制恐慌。在中國歷史上因銅礦源之缺，因銅礦開採技術水平之不進步，銅生產成本之高，由產銅地到鑄銅錢地方運費之高昂，致鑄錢之值常時低於市面商品銅之價值；熔銷因之而起，政府被迫而實行鑄錢貶值，或以鐵錢代替銅錢，最後幣制紊亂，引起商業上的損失，這是不可忽視的一個因素。我們不能同意作者所持意見，明清政府貨幣政策是明智而有建設性的。換言之，貨幣政策對經濟發展是有束縛作用的。其二、政治阻力影響商業發展。在明清兩代，對於人民出海貿易限制是十分嚴格的，出海船隻大小要合規定，要受嚴厲條文管制，出海所載商貨有種種限制，航程中所需食用米糧管制極苛。甚至每船祇許帶做飯用的鐵鍋一口，此外任何鐵器不許帶。商業活動以水運為最便、最廉，沿海貿易在區間貿易上所及的地域較廣。若以歐洲商業資本主義發展過程比較，則中國政治方面對

於海上商業活動的種種限制是不能促進商業資本累積，導致經濟發展的。三、作者反駁某些人的論點，認為中國商人習於小規模經營，不能作大規模的組織，故不能產生工業科技上的革命，並且舉山西票號商人、安徽新安商人證明其非然。最後作者提供一理論試圖說明傳統中國與近代歐洲之所以分歧，何以中國科技水平停滯，而西洋發生工業革命？這是本書第三編要旨所繫。作者肯定認為傳統的中國有發明的智慧，採用外來科技，種植美洲新農作物；西洋器物如砲銃、鐘、千里鏡以及顯微鏡均能仿製，而雕版印刷、航海船隻、掘井、以及用棉以代麻葛為布履、種耕農藝，亦有進步，故泛言中國科技均墨守舊規，亦欠公平。至於說到中國人之企業組合，以陝西涇陽之燃料業、他地之製鹽業為例，說明其企業規模之大。但總的說來，由於各種連鎖性的原因，傳統經濟方面之投入產出關係已成為一定型，因而無法由其內在力量促之發生變化。農業生產力方面已達到傳統科技水平之最高限度，而人口之不斷的增加，消費量激增，遂至無剩餘可儲。在此情形下，平均每一個人之剩餘少，即對貨物之有效的購買力削減。人人但求生存，其他不可多求。而在傳統社會之航運方面，造船航行效能皆已達當時之最高效果，無可再加改良（在傳統技術水平上），運輸費用無可再減。因為這種原因，所以人口增多，糧價上漲。在民食艱難情形下，除移民及開闢新地外，沒有一種力量引向提高糧食產出（output）方面發展。作者就這種現象指出中國經濟在數量上雖有增長，但在本質上幾無改變可言。作者鑄造了一個新名辭：高水平的均衡鍵。到了二十世紀情形為之一變，中國在西力東漸之下，西方科技進入中國後，突破了中國經濟發展的局限束縛——高水平的均衡鍵，從此而有了新的發展。

本書就各方面來說，都可說是大膽而富刺激性的，以現階段中國經濟史的研討水平，而欲作一全面性的、簡化的解釋，自然難期有大的說服力。然而誠如作者在結論中所說，向來研究中國史者專治一枝一節，而忽略中國社會演變全程之一般認識，以致其所治之專題結論不能與整個歷史的脈絡、體系配合，不能明幽發隱。從此點說來，本書肯定的提供了一種歷史的透視。

張德昌